

中国大众的现代西方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哲学在古代中国是玄学，在西方曾经是科学的科学，哲学家习惯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高踞在上俯视大众生活。哲学可以大众化吗？这是一个问题，如今更成了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现代哲学失去了“科学之科学”的地位，遭遇了“形而上学的颠覆”，成为人文学科的一个普通专业。哲学家过去的公众形象是智者和贤人，现在却是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或圈内人士才感兴趣，而局外人听来却不知所云的问题。哲学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哲学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小。“无用之大用”的辩解或“精神贵族”的自诩似乎不能为哲学危机解围，于是中外哲学界中“实践哲学”、“心性之学”、“生活世界”、“修齐治平”、“终极关怀”的呼声此起彼伏，但口号的背后依旧是抽象学说。

哲学可以大众化吗？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那些现在被称为哲学家的古代士人大多出身于耕读传家的乡绅，他们的道德文章虽然有些超脱清谈，但总以民情国事为本，可谓识字知书达礼之人的大众哲学。再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只是众多西学中的一个，在刚发达之时被讥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但经过大众化之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据说蒋介石的案头放着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对幕僚文胆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书？我们不是在军事上被共产党打败的，在哲学上已经被共产党打败了。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哲学可以大众化吗？历史提供了肯定的答案。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大众化的人，以至他的死不但在当时雅典是重要的公共事件，而且成为西方思想史的里程碑，而我们还可以在西方哲学史上找到许多对公众发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大众化的最近事实是启蒙时代的哲学。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时代，只有日耳曼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相互反对的”。尽管两国启蒙思想不同，但社会影响的规模和程度相当。法国的启蒙哲学家的学说控制了舆论民情，导致大革命的发生。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忽视了这一点，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6章“启蒙”一节恰恰揭示了这一点。法国人可能更认可黑格尔。君不见，摆放法兰西民族英雄灵柩的先贤祠门口两侧的是卢梭和伏尔泰，以彰显启蒙哲学家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肇始之功。法国一直保持了尊重哲学的传统，即使在国际地位下降时也能成为哲学思想的输出国。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语言虽然晦涩难懂，但他们对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崛起的功绩不输于法国启蒙哲学家对法国的贡献。马克思说：“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那是指在民族统一之前，德国哲学首先统一了人民的思想。恩格斯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是说马克思主义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中介首先在德国工人中间传播开来。

当“西方哲学可以大众化吗”的问题向中国人提出时，首先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没有做到大众化，因此西方社会也流行“哲学无用论”、“哲学终结说”。其次要看到，中西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差异使得西方哲学更难在中国、通过中文大众化。再次还要看到，哲学工作者中有一种抵制大众化的普遍心态，似乎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考证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恢复中文的“古语系统”就不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读“原汁原味”的外文版就不能理解希腊、罗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外国哲学。“信达雅”的翻译和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本是中外哲学交流和大众化的媒介，现在却被视为学习和研究哲学的障碍。国内外哲学界总有一些人，非要

把哲学道理讲得让人听不懂，以显示学问的高深奥妙；或讲得使人似懂非懂，让听众自愧不如，甘拜大师。鲁迅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的清澈。倘是烂泥潭谁知道它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用现代汉语讲哲学，讲得清澈见底未必浅薄；如果半文半白或中西夹杂地讲哲学，肯定是故作玄虚。

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不求面面俱到，没有体系结构，只是自以为想得清楚、写得明白的一些读书札记而已。